



**【说法不武】**  
公正审判活动需要善意而非恶意的舆论环境,需要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舆论监督。

## 为快播案成为法治公开课点赞

刘武俊

2016年“互联网开年第一案”的快播案庭审直播,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引发巨大社会反响,网上热评如潮,连续两天庭审、直播总时长达到20余小时快播“涉黄”一案,直播期间累计有100余万人观看视频,最高时有4万人同时在线。快播案舆情、技术与司法交织的多元局面,庭审控辩双方表现的社会评价、技术中立能否成为有效抗辩事由,以及由本案衍生出来的诸多问题,都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关切。

笔者认为,快播案庭审直播已经成为一堂生动的法治公开课,让无数网民见证了法庭辩论的魅力和看得见的程序正义。广大网民、司法人员都将从这起案件中获得尊重辩护权利、妥善处理舆论监督与独立审判的关系等

有益的启示。

快播案式的网上庭审直播应为“互联网+”时代司法新常态。这次快播案网上庭审直播,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意义,就是互联网+庭审的技术潮流,连续两天庭审、直播总时长达到20余小时快播“涉黄”一案,直播期间累计有100余万人观看视频,最高时有4万人同时在线。快播案舆情、技术与司法交织的多元局面,庭审控辩双方表现的社会评价、技术中立能否成为有效抗辩事由,以及由本案衍生出来的诸多问题,都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关切。

笔者认为,快播案庭审直播已经成为一堂生动的法治公开课,让无数网民见证了法庭辩论的魅力和看得见的程序正义。广大网民、司法人员都将从这起案件中获得尊重辩护权利、妥善处理舆论监督与独立审判的关系等

关切,主动向公众释疑解惑。庭审网络直播的基本前提是要确保“司法归司法”,法院的独立审判应当不受舆情的干扰甚至绑架,不能出现偏激法治理念的“网络审判”。就快播案而言,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任何突破法律底线的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尽管网络舆论呈现一边倒的倾向,超过九成的网络受访者选择“快播无罪”选项,但司法机关不能迷失在舆情的漩涡中,而应认真甄别和吸取舆论中来自法律界和网络技术人士合理的观点,理性地独立审判。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新闻舆论监督张弛力度的传媒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彰显司法权威的法治时代。司法机关与新闻媒体打交道正在越来越趋于频繁。司法如何直面传媒,传媒如何监督司法,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网络舆论尤其是新闻舆论监督

既要积极地有所作为,也要保持理性的心态和良好的限度感;同时,司法机关在主动接受媒体舆论监督的同时,也要妥善处理好司法与传媒、司法审判与舆论监督的关系,既要保持审判活动的开放性,避免对新闻监督的不当限制,也要防止舆论的不当干预对独立审判和公正审判的负面影响。媒体的新闻舆论既要发挥满足和保障公众的司法知情权及表达自由,又要发挥监督、督促和支持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的建设性作用,防止出现所谓舆论审判、恶意炒作等对独立审判和公正审判的破坏性效应。

审判活动本质上是一种高度理性化、专业化和程序化的判断推理的过程,要求法官尽可能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要求审判活动尽可能排除情感因素以及外界非法律因素的干扰和介入。如果舆论过于热衷

炒作,甚至俨然搞成“舆论审判”,就有可能诱发法官哗众取宠的潜在心理,同时也可能给法官造成过大的心理压力。舆论监督要注意防止形成情绪化的“舆论审判”,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其后果将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实践中的,确有个别案件的判决是法院迫于承受过大的舆论压力而作出的完全迎合舆论呼声的判决。这种判决可以博得一时的快人心,但其公正性是值得怀疑的。这方面的案例及教训其实并不罕见。

公正审判活动需要善意而非恶意的舆论环境,需要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舆论监督。快播案终将尘埃落定,而由此引发的思考仍将继续。让我们为快播案这样一堂精彩的法治公开课点赞,也期望快播案式的庭审直播真正成为司法新常态。  
(作者系《中国司法》杂志总编)



**【经济史谭】**  
“农桑者,小民所自劝也,非待法而驱也”,原因何在?很简单,农民也是自利的经济人。

## “劝农”还是“伤农”?

黄波

翻开《汉书》、《后汉书》,很容易发现,汉朝的皇帝对农业真是太重视了,重农的诏令连篇累牍不厌其烦。文帝2年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务末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景帝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饥之原也”;东汉章帝在初登大位的诏书中也忧心忡忡地表示,“比年牛多疫疾,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

为了表示对农业的重视,汉朝还恢复了一种古制,即“天子亲耕藉田”。春耕前夕,皇帝在京城近郊划一块地,拿着农具“表示”一下,意味着全国性的春耕正式开始。制度设立之初,皇帝可能还真的下地劳动了,但后来渐渐

成为了纯仪式的活动。一言以蔽之,无论是从九重深宫中发出的重农的诏令,还是所谓“亲耕藉田”,主要还是一种象征的意义。

于是有后代一些史读者对此不满了,他们批评类似举动只是官样文章,无补于农业生产之实际。那么在传统社会,最高统治者要表现其对三农的重视,究竟怎样做才具有实际意义呢?

南北朝时期,北魏的皇帝的“劝农”活动似乎颇有实际价值。北魏的第三位皇帝拓跋焘是一代雄主,也重视三农,他下的一道重农诏书后来得到了《资治通鉴》编撰者的称赞。与汉朝皇帝相比,拓跋焘不仅表现出了“重农”的姿态,而且做出了“劝农”的实质性动作;他在诏书中要求州县的父母官“下基层”劝导农民种地,并自称这只是在学“圣人之道”。

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等人表扬拓跋焘,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从汉朝开始,最高统治者重农的诏书已经日益成为一纸具文,对基层行政并没有影响。现在好不容易等到拓跋焘有了劝农的具体措施,而且还加上了学圣人之道的名义,即使是儒家知识分子心中的“异族”,也要毫不吝惜地给予赞词了。

然而,在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看来,无论是拓跋焘的“劝农”,还是司马光等人对“劝农”的赞誉,都是有害的。

在《读通鉴论》第十五卷中,针对“魏诏守令劝课农事”,王夫之有一段十分透彻的论述:

“有不待劝者,士之学也,农之耕也……士无志于学,劝之而不学,弗能有益,而犹无伤于士。若农,则无志于得粟者矣。其甚者,既劝之而固不加

勤,而劝之也,还以伤农。方其恪恭于耕之日,士女营营,匪朝伊夕,从事于陇首,而吏拥车骑喧于中野以贰其心,则民伤,于是刻核之吏,搜剔垦莱以增益其赋,苛求余丁以增益其役,而民益伤。”

在王夫之看来,世间有两种活动不需要“劝”,一是士人求学,二是农民种地,因为其中存在明确的利益。“学而优则仕”,士人求学当然不需要他人的劝勉,而哪个农民不希望在地里收获更多,又何待劝?

如果居然不懂这个道理,硬要出头劝勉,后果又会如何?劝士人求学,没有效果但也不会有多大坏处,但是“劝农”则不然。“方其恪恭于耕之日……”这一大段话描绘了这样一副生动的场景:农民在自家地里辛勤劳作,下基层“劝农”的官吏却车马喧

闹,在田头指手划脚,这到底是“劝农”还是“扰农”?

王夫之进一步警告,“劝农”极有可能滑向“伤农”,因为基层官吏为了向上显示劝农有功,难免要“饰美增赋以邀赏”,如此“天下之病何言哉!”他说元朝的统治者课民种桑也是如此,其强令不宜种桑的土地也要种桑,“桑丝之税加于不宜种桑之土”。明朝也沿袭了此种弊政,致使“害教于四百余年而不息”。他认为无论是北魏的劝课农事,还是元明两代统治者的课民种桑,都是“贼道而害及天下”的举措。他强调,“农桑者,小民所自劝也,非待法而驱也。”

“农桑者,小民所自劝也,非待法而驱也”,原因何在?很简单,农民也是自利的经济人。

(作者系湖北杂文家)



**【缘木求鱼】**  
对几个为恶者的严厉惩处,不但是保护善良者的应有之义,更是对律己不严者的一种警戒。

## 为恶不处 良善不彰

木木

英若诚,生长在一个大家庭,估计是因为聪明又伶俐的缘故,小时候很得长辈的喜爱。

有一次,还不太肯定自己被爱得有多深的小英若诚,想检测一下,于是在饭点儿玩“失踪”——悄悄躲进了餐厅的柜子里。不过,现实总是很残酷,从开饭到餐毕,居然没一个人意识到饭桌上少了人——或许是饭菜太香,或许他压根儿就没那么重要——反正,当小英若诚落寞地从柜子里爬出来时,餐厅里已经空无一人;最后,他就只能胡乱扒拉两口饭,默默离开。

自此,英若诚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斤两;而一个明白自己斤两的人,说话、做事,大约才靠谱儿。从这个角度

看,英若诚显然是幸运的,一个不疼不痒的“小教训”,就把他顺利推上了正确的人生轨道,并使他很早就明白了人生的真谛。而当年推他“入轨”的长辈,或许真是无心为之,也或许就是刻意为之;但无论如何,如此的“手段”,都是只有聪明人才能干得出来的事。

聪明的家长培养孩子,一般都特别注意从小处着眼,有时候,小孩子于不经意间的一言一行,甚至一颦一笑,也能让其警惕起来,并马上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应对。如此管束、调教出来的孩子,人生之路大约也不会偏到哪里去。要想使一个孩子将来成才,或者哪怕仅仅拥有一个比较正常的人生,就需要从小的时候、在每一件小事上下功夫,这大约也是中国的一个老传统。中国有句老话,所谓“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就是提醒为人父母者,教育孩子要抓住童年的关键期。

过去,在一些规矩多的人家,小孩子们过得大约都不怎么舒服,不但“动辄得咎”,而且似乎谁都能唠叨、教训你两句。不过,这几十年来,如此“损害儿童天性”的老旧家庭,应该是越来越少了,现在都讲究“张扬天性”。有了如此的时代主旋律,小孩子当然就自由自在得多,想说什么就说,想干什么就干,想要什么就有;不过,自由自在到极致,往往就免不了要出事。

前几天,媒体报道,去年在美国因琐事绑架、侮辱、折磨女同学的3个中国留学女学生,被美国法院判处了6至13年不等的刑期,而且刑满后将被驱逐出境,这个案件,去年在中美两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反响来反响去,对

那几个很下得去手的小留学生,当时中国网民的态度居然极为难得地取得了空前的一致,都认为应该严惩。现在,美国法院的判决一出,中国的网络上立即叫好声一片。

显然,网民的欢呼,既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恶行者终于遭到“严惩”,总是大快人心,同时,这欢呼大约也少不了对国内现实的一种情绪上的反动——同类性质的案件,在中国,往往就是一阵“洒洒水”的“毛毛雨”,甚至许多时候,连“毛毛雨”都算不上。那个不远万里跑去美国“掏钱平事儿”的家长,大约真算得上是对中国习惯的一种本能反应。

中国的现实是,“宽是害,严是爱”之类的警世恒言多之又多,但在实际操作中能严格执行的,却少之又少。尤

其现在,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大跃进,兜里的钱多了,人们的“爱心”就难免要泛滥。但是,这样的“爱心”,对许许多多的小孩子而言,就可能不是什么好兆头。如果家长们连生个老二都要担心磕碎了老大的“玻璃心”,如此呵护出来的小苗苗,今后的人生路走起来恐怕就会坎坷多多。

美国法院的严厉做法,中国人倒真的不妨借鉴一下:对几个为恶者的严厉惩处,不但是保护善良者的应有之义,更是对律己不严者的一种警戒。虽然对那几个“不懂事”的小女留学生而言,十多年的刑期看起来很严重,但比起恶行不处之后犯下更严重的罪行并最终得到更严厉的制裁,或许就慈悲得多。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在微信的海洋里  
采撷最精彩的浪花

## 中国经济主逻辑的边际变化

2015年发生的边际变化就是汇率问题。人民币出现贬值,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从2014年6月份开始,中国官方外汇储备开始降低,在此之前是一直往上走的。经济学里重要的原则是趋势的转折,它的意义远大于具体的数值变化。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中国一直保持这两个大项双顺差大概30年时间。经常项目中国仍然是顺差,但是资本项目出现极大变化。经常项目2014年全年中国在货物贸易上顺差4350亿美元,而2015年3个季度就顺差4157亿美元,主要原因是进口的跌幅比出口的跌幅更大。但是服务贸易,比如美国大片,中国一直是逆差。2014年全年中国付了1510亿美元,

2015年3个季度就付了1609亿美元。所以目前是两个矛盾的趋势,即商品方面衰退式的顺差扩张,服务贸易则是逆差扩大。

直接投资(FDI)是国外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减去中国给对外的直接投资,过去30年中国的FDI一直是顺差。2004年到2014年,每季度有500亿美元左右FDI净流入中国,2014年降低到400多亿美元。2015年第三季度是24亿美元,为公布该数据以来最低点,就算是1990年代每个季度也是80到90亿美元之间。FDI净流入中国,代表着国际生产链条愿意将更多的生产环节放到中国来生产,反映了中国的

竞争优势。过去二三十年不断有跨国企业将它自己的生产环节搬到中国来。现在,大量中国企业将自己的工厂撤离中国,搬到了比如说东南亚国家去。从500亿美元到24亿美元的变化,这背后发生的故事是中国在全球生产链条里的所占比例出现了逆转。

另外的指标,比如说证券投资,我们之前一直是顺差,但是2015年三季度出现越来越大的逆差。其他投资,2014年二季度之前一直是顺差,2014年二季度出现逆差,目前逆差已经从700亿美元左右上升到2250亿美元左右。其中的贷款,包括国外对中国的贷款减去中国对国外的贷款,以前是顺差,去年出现逆差。而且逆差越来越

大,已经达到了2469亿美元。

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货币政策或者宏观政策就受到约束,不能让这种状况失控。中国汇率波动以及资本流出的状况主要是跟跨境资本流出相关,而不是跟贸易状况相关。那么跨境资本流动背后的决策依据是什么呢?对资本而言就是投资回报率。风险资本回报率可以美国上市公司ROE代表,它一直非常稳定,均值15%,除非是在经济危机期间最低曾跌到9%,现在恢复到15%。中国股改之后,上市公司的ROE大概也是15%左右。但是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出现持续稳步的下行,现在大概是10.3%左右。中国风险资产回报率比美

国低了40%,这方面的劣势需要用无风险资本回报率的正利差来弥补。在此之前中美两国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是大概相等的,随着风险投资回报率距离拉开,我们在无风险资产回报率的距离也开始拉开,这就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提供了底线,也就是你的无风险国债收益率不能比美国低,否则资本肯定会加速流出。我相信中国要的是我们的跨境资本流出不是不可控的状况,所以中国的国债收益率就会有一个底线,不能低于美国。中国投资回报率在降低,也会压迫利率下行。但是同样利率下行也有底线,即不能低于美国同样的利率水平。

(摘编自“港股那点事”,作者:刘海影)